

大国发展问题丛书

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

——大国发展经济学难点探索

陈文科 等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DAGUOFAZHANWENTICHONGSHU

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

陈文科 李享章 熊维明
林后春 沈佳斌 刘汉全 史贤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大国发展的十大困惑
——大国发展经济学难点探索



陈文科等 著

出版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邮政编码 430022

发行科电话 (027)5829493

责任编辑 陈金安

印刷者 鄂州市委机关印刷厂

开本 1/32

发行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张 8.75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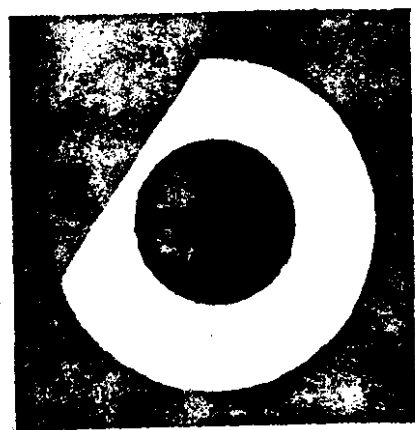
印数 1—2000 册

字数 220 千字

ISBN 7-216-01555-x/F·244

定价:5.40 元

本书如因印制质量不合格,可以由印刷厂调换



《大国发展问题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夏振坤 廖丹清 陈文科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文忠志	方 涛	尹汉宁	卢福咸
冯光明	朱建中	刘汉全	刘鼎华
阳小华	李享章	李剑星	李荷宝
吴奉刚	马进泰	沈佳斌	陈文科
林后春	周铁虹	袁义才	夏振坤
龚益鸣	曾健民	廖丹清	熊维明

《大国发展问题丛书》序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历史要前进,社会要发展。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尤其令人注目。发展中大国,不论属于何种社会经济制度,概无例外地都是农业大国,甚至是穷国,都面临着诸多发展难题。例如人口、生态、灾害、短缺、农业、农民、二元结构以及体制、传统,等等。不妥善地解决这些既涉及生产力要素配置,又涉及生产关系具体形式调整等方面的问题,发展中大国就不可能较快地发展生产力,发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是我们要研究当代大国发展问题的宗旨之一。

宗旨之二,研究当代大国发展问题,是创立新型发展经济学中的应有之义。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在《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一文中,明确提出应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即:“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并强调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要以那些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埃及和中国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亚洲“四小龙”一类国家和地区的问题。这已是发展经济学本身革新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宗旨之三,研究当代大国发展问题,剖析发展中大国,特别是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发展的诸方面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也是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传统等,在发展中大国中有较大的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建立

社会主义 4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10 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或不同程度或部分地解决了上述发展中的难题,并正在进一步解决这些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大国,而且是改革中的大国。为此,较多地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研究(包括纵横比较研究)发展中大国的历史、现状及趋向,从中探讨大国发展的若干共同规律,不论对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探索世界发展中大国发展的普遍规律,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此,湖北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在“八五”期间倾注全力编著《大国发展问题丛书》,并以为序。

夏振坤 廖丹清 陈文科
一九九二年元旦 于武昌东湖

目 录

《大国发展问题丛书》序	(1)
导言：发展经济学的突破与大国发展的困惑	
一、从注重小国到注重大国：发展经济学	
研究对象的根本转变	(1)
二、大国发展经济学的十大困惑：新型发展	
经济学研究的十大难点	(7)
三、走出纯经济分析的“胡同”：大国发展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7)
第一章 人口	
第一节 人力资源	(24)
第二节 人口爆炸	(31)
第三节 就业模式	(35)
第四节 人口流动	(41)
第二章 结构	
第一节 经济结构的二元性	(50)
第二节 结构转化的步履维艰	(54)
第三节 中国二元结构转化的轨迹与理论启示	(60)
第三章 生态	
第一节 生态与资源	(68)
第二节 大自然惩罚	(74)
第三节 生态与经济	(81)
第四节 生态与社会	(88)

第四章 灾害

- 第一节 灾害的类型与特点 (94)
- 第二节 灾害与区域发展 (102)
- 第三节 灾害与制度 (110)
- 第四节 大国灾害防御的战略抉择 (117)

第五章 短缺

- 第一节 短缺的几个理论问题 (121)
- 第二节 大国短缺的成因 (125)
- 第三节 短缺条件下大国经济发展难点 (137)

第六章 债务

-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与外债 (141)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形成与后果 (146)
- 第三节 债权国与债务国——债务危机的本质 (152)
- 第四节 债务的适度与操作 (159)

第七章 市场

- 第一节 市场的难产 (166)
- 第二节 发育的市场锥型 (177)
- 第三节 大国的农村市场发育 (190)

第八章 体制

- 第一节 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 (197)
- 第二节 城市与乡村 (202)
- 第三节 地方与地方(块块与块块) (207)
- 第四节 政府与企业 (212)

第九章 农民

- 第一节 农民与农业 (218)
- 第二节 农民与农村 (227)
- 第三节 农民与城市 (234)
- 第四节 农民与改革 (241)

第十章 传统

- 第一节 巨大的幽灵…………… (248)
- 第二节 中央集权…………… (256)
- 第三节 重农抑商…………… (261)
- 第四节 均田地…………… (266)

导言：发展经济学的突破与大国发展的困惑

从西方引进的发展经济学正面临严重挑战，其研究对象（大多以发展中小国为主）、研究方法（以照搬西方经济学范畴、概念、公式，并单纯以经济因素分析为主）的缺陷，日渐显露。发展经济学要走出目前困境，唯有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重新获得生命力。

一、从注重小国到注重大国：发展经济学 研究对象的根本转变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曾多次呼吁和阐述，必须对西方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首先要“扩大研究范围，即将研究的重点由实行市场经济的小国及地区转向那些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不论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①笔者非常赞同张老的主张。提出这种观点，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和理论的探索，而且有当代中国与印度等大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实践作支撑。应该讲，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从注重小国到大国，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实践的必然要求，它将是一种带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西方发展经济学危机的开始突破，同时也意味着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正在诞生，代表了发展经济学走出危机，获得新生的历史必然。

^① 见《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

首先,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具有发展中小国的研究所不可比拟的普遍意义,发展研究更应研究大国。

研究资源多样,人口众多,有着古老文明传统的大国,其重要的意义在于:第一,发展中大国首先是资源大国,其发展既可以对外开放,实行内外结合的良性循环,也可以内生式自我循环。作为资源大国,发展中大国资源多种多样,而且资源之间具有代替性和互补性。它凭借资源的多样性及互代性、互补性,而且国内的现实及潜在的需求与市场容量巨大,即使不与外部经济社会发生任何联系,搞封闭、半封闭,也可以实行国内诸种资源的配置,实现自我积累、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这是任何小国,包括发展中小国所不能做到的。假如小国一旦自我封闭,无异于自杀,连生存都将会成为问题。第二,与资源丰富多样(主要是指拥有的资源总量丰富,不一定是人均占有资源量丰富)相联系,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过程往往是比较完整的经济运行过程。一方面,从产业的种类、范围来看,其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包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全面发展,而不同于发展中小国资源稀缺,没有农业,或者只有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或者主要只有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从产业的内涵性质来看,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各个层次。虽然总的趋势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代替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资本密集型代替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代替资本密集型,但发展中大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很突出,即令专业化社会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适应生产力发展多层次的特点,仍然还要保留并适当发展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发展中大国是人口资源大国,必须高度重视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协调配套。人口问题突出表现在:既要解决人口(吃饭)问题,又要解决人手(就业)问题;既要解决现实的人口问题(吃饭和就业),又要解决潜在人口问题(计划生育控制)。为此,发展中大国除了重视物资扩大再生产外,还要把控制人口再生产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抓。要真正使人口

再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不像小国那样人口较少,吃饭与就业压力不那么大,人口再生产控制一般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其次,大国的发展规律与历史轨迹大大不同于小国,研究小国不能代替研究发展中大国。

大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途径、方式,与小国是显然不同的。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西蒙·库兹涅茨和霍利斯·钱纳里在其论著中,就作了这样的分析:在工业化初期(人均 GNP 为 200—300 美元时),大国工业所占比重普遍高于小国 15 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量大都超过小国的 50%。^① 如果注意到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及传统等因素的重大作用,那么大国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矛盾更加特殊,更加复杂。特别是与社会、文化及其传统相联系,大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大大不同于小国的。发展中大国除去地大物博人多外,大都不同程度地背着沉重历史遗产的巨大包袱,尤其是长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奴役统治下所遗留下来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影响和破坏,在诸多方面阻碍着或制约着大国应有的较快发展。因此,研究发展中大国,不能就经济发展论经济发展,而应把它看作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发展与变革的过程。西方发展经济学试图以若干个数学模型和抽象理论体系来解释甚至要解决发展中大国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显然是文不对题,十分软弱无力,它至少回避了历史传统作用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实,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徘徊,重要因素之一是“历史幽灵”的徘徊在作怪。发展中大国只有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奋力冲破阻滞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幽灵”,包括一切旧文化、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才有可能顺利地推进工

^① 参见库兹涅茨:《各国经济增长:总产量和生产结构》(1971年);钱纳里和泰勒:《各国和各时期的发展型式》,《经济学和统计评论》卷第4期(1968年1月);钱纳里和塞尔昆:《发展中的型式》(1975年)等。

业化和现代化。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实践已表明,对旧的东西冲破得越彻底,新的事物才越易于成长,也才愈获得图强与革新。既然大国与小国在发展规律与历史轨迹方面有诸多的不同,那么就不应“以小代大”,即以 小国研究代替大国研究,而要相应地转变到以发展中大国研究为 主的轨道上来。

再次,西方发展经济学从出发点与方法论均有缺陷,以小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明显不足。

发展经济学就本来的意义上讲,重点是研究战后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发展民族经济,消灭贫困,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门经济学。但由于诸种原因,这门学科战后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它作为战后西方经济学的新的分支,其研究出发点和方法论都带有种种先天性的缺陷。所谓出发点缺陷,无非是它唯西方经济学立场之是从,宣传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并按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来“发展”(实际上是改造)第三世界。所谓方法论缺陷,是指西方发展经济学往往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实践中所抽象出来的范畴、概念、分析工具等,不加区别地套用到第三世界各国。不应否认,从亚当·斯密创立西方古典经济学到战后出现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其许多的合理内核,假如用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具有一定的实证性,不愧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或“解剖刀”。但是,如果把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生搬硬套到发展中国家头上,那就大相径庭,如同给病人开错了“药方”一样。结果以此为理论基础制定的诸种经济政策或适得其反,或收效甚微。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一度犹如走进“死胡同”,其源盖出于此。现实情况表明,以小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研究发展经济学,其典型性明显不足。因为若干小国或地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成功乃至仍然具有生命力。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战后40多年间,除了由于特殊资源条件而迅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的石油国家外,发展比较成功的是 11 个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其中只有巴西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其他 10 个国家或地区,即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它们的幅员和人口都极其有限,有些不过是一个都市而已。即使是巴西,尽管在 1968—1973 年一度创造了工业平均增长 10.4% 的奇迹,但那是建立在高外债基础上的,因而好景不长,已由过去的“巴西奇迹”到 80 年代的债台高筑,一落千丈,又创造了 1000 亿美元高外债和超过 100% 的高通货膨胀率的所谓“双高”新奇迹,而今不得不仰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日子。这就足以证明,巴西 60 年代的“成功”、“繁荣”并不是真正的成功和繁荣。在其他 10 国或地区中,类似巴西情况尚未暴露者也并非没有。由此可见,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也仅仅是在第三世界,为数极少而又不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若干成功的经验。相反,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都还不能断言从根本上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况。可以说,在第三世界占绝大比重的大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得不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是不能奢谈或没有资格谈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成功的。它也从反面说明,发展经济学如不因势利导,转向以发展中大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那就犹如“无米之炊”,其自身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完善和新生。

最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的转变,还在于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面临着许多突出而急待研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战后相继独立的发展中大国,在刚刚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但战后不久,特别是在 50 年代下半期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遇到的矛盾较多,前进步履维艰。以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为例,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印度在 1947 年独立,新中国在 1949 年诞生。至今,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东方大国均走过了 40 多年的历程。对两个大国 40 年间发展轨

迹作分析及比较,最直观的印象至少有两点:其一,社会主义中国比资本主义印度为快,如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大幅度提高,而印度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明显,中国在高科技工业的大多数领域比印度发展快,技术先进等;其二,无论是社会主义中国,还是资本主义印度,如果与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及资本主义世界新兴的工业国家及地区作横向比较,总起来说发展不够快。即使是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 29 年间发展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两个发展中大国发展相对滞后,突出表现在三大问题上:两国国民经济仍然呈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即是部分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的现代工业与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并存,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如沿海地区)与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并存,部分先进的大中城市与落后的广大乡村并存;两国均以国内市场为主,经济发展的内向化程度仍然较高;两国的人口膨胀依然困扰着经济发展等。前一种情况,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用“制度论”,即制度的不同来解释还是有说服力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但解释后一种情况就复杂多了,因为它要阐明二者共同的深层原因,即为什么印度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所发展却不够快?应该承认这里面,除了两国各自的特殊制约因素外,是否还有制约两国发展的某些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既要坚持“制度论”(否则不能解释起点及诸种条件大致相同的两个大国,经济发展效果不同),但又不能“唯制度论”,以“制度论”代替对二者共同的深层原因分析。80 年代以来中印两国各自以完善原有的基本制度为目的,相应推进改革,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两个不同制度的大国发展都不够快,除了制度因素及各自的特殊因素外,还应有制度以外的因素,或者说有超越于制度之上的因素。这种制度以外或超越制度的因素对两个大国发展是有着明显阻滞作用的,至少不外以下两类因素:一是体制因

素。经济体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一定的经济体制是一定的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但既是经济体制,不论何种制度总有其共同的方面。从经济运行角度考察,经济体制的集中表现应是经济运行机制,特别是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就这个问题而言,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很难说做到了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当然中国80年代改革以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有了新的进展)。也许这是战后两个发展中大国不如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以至影响经济发展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历史因素。中国与印度既是历史悠久的大国,又是战后发展起点很低的大国。两国要发展经济,不仅要与历史遗留下来的贫困落后、“一穷二白”作艰苦卓绝斗争,同时还要与阻碍发展的“历史幽灵”,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在物质与精神两条战线展开作战。不难想象,两个曾经“饥寒交迫”的大国,独立后带着巨大的历史包袱“负重行军”,无论怎样也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及资本主义小国或地区那样轻装上阵,行动自如。总之,上述发展中大国面临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发展经济学开辟了新的领域、新的天地,也是新型发展经济学须要攻克的难关。它要求新型发展经济学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分析发展中大国的曲折与艰难发展,把特性的分析与共性的分析结合起来,把制度的分析与非制度的分析结合起来,在非制度的分析中,特别是要把体制的与历史的分析结合起来,以便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二、大国发展经济学的十大困惑:新型发展 经济学研究的十大难点

既然发展中大国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大国,那么,无论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点看,还是从历史文化传统的渊源自,其研究的内容远比发展中小国丰富得多。无须追溯更远的历史,仅仅战后40多年来的一部世界经济史就已证明,发展中大国,

抑或是社会主义大国(如中国),抑或是资本主义大国(如印度),抑或是其他大国,其经济社会发展大体面临着以下十大困惑。这十大困惑既是发展中大国振兴腾飞的难点,也是新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难点。

1. 人口困惑。

人口困惑或人口难题,主要表现为人口过多,带来吃饭、就业与建设等一系列相应的问题,以至人口与人手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首先,从人口看,人口多,不易控制乃至“人口爆炸”,必然加剧人口多与耕地少的矛盾,耕地承担压力太大;人口与吃饭的矛盾,粮食供给不足;人口与建设的矛盾,人口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其次,从人手看,固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人力资源,但这种丰富还只是数量型丰富,其质量(包括文化技术管理素质)还不高,也带来两方面的具体矛盾:一是人力资源过多与劳动就业门路不足的矛盾或大量劳动力不能就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或导致劳动力“盲流”,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二是人力资源又多与又少的矛盾,即素质不高的劳力资源较多,素质较高的劳力资源较少,以至不少行业、产业、企业需要的合格劳力紧缺,而不需要的非合格劳动力过多。再次,从人口控制看,经济发展越是落后,人口控制困难越大,人口增长越是迅速,在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方面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不仅在一个发展中大国是如此,在发展中大国所在的发展中地区也同样如此。

2. 结构困惑。

所谓结构困惑,这里主要指经济结构困惑,它集中表现为差异结构。一般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存在差异结构,但远不如发展中大国突出。发展中大国的差异结构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地区多元结构。发展中大国幅员广大,各地区间的历史、地理、人口、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国内可划分为发达、中间与欠发达等类型地区,各地区之间的关系,甚似国际上的“南